



| 光明社科文库 |

文化自信 大学之道

大学文化研究论文辑刊二

王晓阳◎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光明社科文库 |

文化自信 大学之道

大学文化研究论文辑刊二

王晓阳◎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自信 大学之道：大学文化研究论文辑刊二 / 王晓阳主编.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 7

ISBN 978 - 7 - 5194 - 4288 - 0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6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9190 号

文化自信 大学之道——大学文化研究论文辑刊二

WENHUA ZIXIN DAXUE ZHI DAO——DAXUE WENHUA YANJIU LUNWEN
JIKANER

主 编：王晓阳

责任编辑：杨 茹

责任校对：赵鸣鸣

封面设计：一站出版网设计部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100050

电 话：010 - 67078251（咨询），63131930（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yangru@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电话：010 - 67019571

开 本：170mm × 240mm

字 数：426 千字

印 张：21.5

版 次：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94 - 4288 - 0

定 价：9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理论探讨

提高哲学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开拓中国大学之道	胡显章	3
教育与文化——关于文化教育的哲学思考	孟建伟	10
论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关系	宋 伟 张德祥	21
大学文化的时代品性与特征	宫福清	28
文化自信与大学精神	刘亚敏 冯惠敏 熊 淦	37
论当代中国大学之道与文化自信间的关系	陈 抗	45
论“大学之道”的理论内涵及实践意义	董 晔	54
略论大学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和路径	乔雪竹 张小锋	61
中国传统德性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释义	张 磊	67
论红色文化与大学之道	邱小云	77
新形势下文化安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项 洋	83
大众传媒视域下大学文化发展研究	彭鸿雁	90
场域理论视角下高职院校文化传承与创新之道	李成明	95
文化实践:现代大学文化研究的哲学视角与进路	张乐农	104
民办高校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的路径探析	高燕林	118

文化建设

兴学强国——中国大学的道路选择	雷 鸣	129
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对校友成长影响实证研究	钟 玮	138

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探索	杨 静 叶佳琪 童 宽	145
大学文化要讲好故事编织梦想	章 兢 齐绍平	155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大学文化建设	赵玉娟 冯大同	161
欠发达地区重点高校的文化底蕴及品牌建设内涵研究	李彩艳	168
校史档案助力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探索	张彩会 赵宪珍 李 娟	179
基于传统书院文化的当代大学精神建构	周凤梅	187
鄂尔多斯文化与鄂尔多斯地区高校校园文化融合的实现途径	杨 梅	191

文化育人

“工匠精神”与高职院校“文化育人”	徐平利 陈秋明	199
大力弘扬墨子工匠精神,筑牢高职教育文化根基	夏 伟	207
当代大学精神建构与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和谐职业人”培养的创新实践	李海洁	215
大学公共空间的教育属性与文化反思	蔡先金	225
导师的补修课 研究生的必修课	隋允康	234
从文化育人视角下探讨大学文化建设	邱晓飞	242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地方高校素质教育特色	甘筱青 李宁宁	249
红歌传唱:井冈山精神跨越时空的讴歌	王金海 李 霜	258
用好主渠道 筑好主阵地 唱好主旋律	肖池平	264
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及实施途径	任遵诺 文素俭 薛彦华	268
打造立足区域、专注育人的特色大学文化建设	徐启达 姜素锦	277
“一带一部”背景下湘商文化的教育传承研究	廖 佚	282

国际比较

“同分异构”视域下的中西方大学文化演进与发展	李成恩 侯铁珊	289
洞悉哈佛大学建筑空间设计背后的校园文化	曹盛盛	301
精英教育的契机与危机——以牛津大学为例之理性探析	张睦楚	314
试论大学知识生产范式之演变	安娜丽 陈·巴特尔	323

01

| 理论探讨 |

提高哲学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开拓中国大学之道

胡显章
(清华大学)

世纪之交以来,以 2002 年清华—北大—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直至 2017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的建立为标志,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有了普遍的提升,大学文化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当今面临的一个共同命题就是进一步提高大学文化自觉,特别是大学的哲学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开拓中国特色的大学之道,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哲学自觉是文化自信的最高境界

一段时间里,文化自觉成为出现频数越来越高的词汇,这个词汇最先是费孝通先生 1997 年在北京大学正式提出的。费先生回顾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多世纪里,对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文化选择的艰苦历程,提出要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带到文化自觉中去。指出文化自觉“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他一再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这种通过反思来提高对主体思想的主动认识就是一种哲学自觉。因为“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活动,或者说,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方式”^②。当今,大学人应该在国际文化交流激荡背景下,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所依据的理念进行理性的反思,以提高自身办学的文化自觉。高等教育在提高人

①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03 页。

② 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6、150 页。

的主体思想的反思自觉和能力上起着关键性作用,而这种反思自觉和能力正是文化自觉自信的基础。

目前,中华民族正在加速实现伟大复兴,文化的反思和振兴是其重要的前提和内涵。中国大学在本质上是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是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源泉,对于民族伟大复兴肩负重大责任。大学人应该深刻认识文化在历史进步和大学自身建设中的作用,正确把握国家文化发展和大学文化建设的规律,主动担当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为此,大学人首先应该通过整体性的反思,认识在人类文明进程和中国历史文化演变中,中国大学文化的由来、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有益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向,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发挥好先进文化对自身、对社会的引领作用。

由于哲学对人的行为具有价值规范、思维导向和理论升华的功能,欲使文化行为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并沿着理性方向前进,就应该使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正如马克思 1842 年在《科隆日报》社论中所指,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大学人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哲学自觉,哲学自觉是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

二、拓宽中国大学之道的哲学基础

教育与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许多教育家往往也是哲学家。在中国古代,教育与哲学难以分割。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代表作《大学》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启迪性论述,对中国教育有着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在著名的教育论文《大学一解》中,对其做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大学》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体现了“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指出“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亲民”。重视明明德与亲民,体现了儒家人生哲学与教育思想始终如一的核心。指出“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可以理解此处的大学之道是强调通过求知,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获得洞悉事物本质和待人处事的智慧,同时通过教化、修养、陶冶,适应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联系到美国教育家、高等教育哲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约翰·S.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到的:“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可以认为两者在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上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我在主持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时,在上述基础上,从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等四个视角探讨了大学精神文化的哲学基础,

可以认为是在哲学上拓宽中国“大学之道”的一种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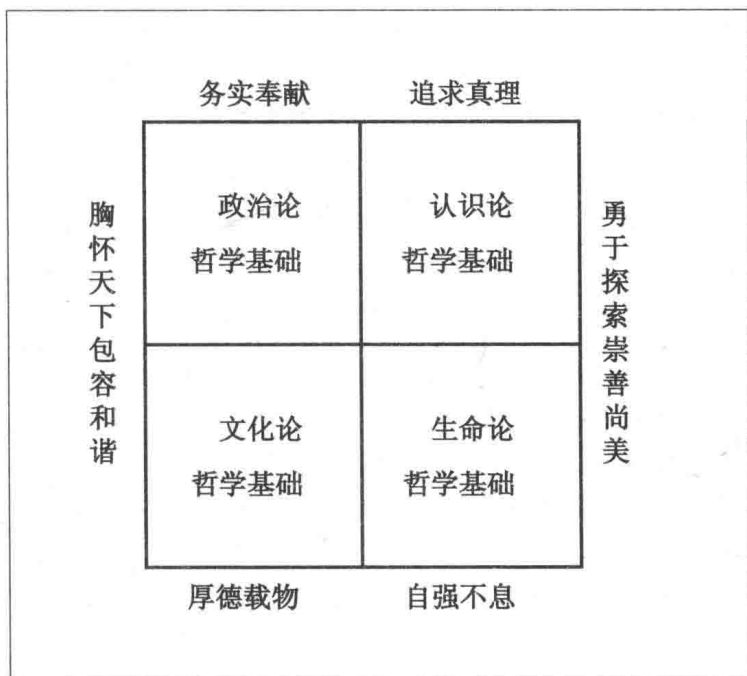
基于认识论哲学基础,指出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传授、发展高深学问,要求大学人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保证真理的客观性。

基于政治论哲学基础,指出大学要担负起服务于国家和公众利益的责任,要求大学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务实奉献。

由于人是教育的主体,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的实践,离开了人的生命,教育就失去本源。原湖南师大校长张楚廷提出了教育的生命论哲学基础,其基本点就在于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大学的中心位置,倡导以人为本和人文日新,追求真善美。

王冀生研究员在其论著《大学之道》中指出:“大学从本质上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它处于人与文化相互建构的高级阶段。大学的重要功能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实现人的文化化。所以我认为,从文化论哲学基础的视角来探讨大学功能的定位和规律十分必要。基于文化论哲学基础,要求大学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植根优秀传统文化,包容会通人类文化精华,在综合中推进文化的传承创新。关于文化论哲学基础是初次提出,是我 20 余年从事大学文化研究的心得,对此仍有不同意见,希望能够引起讨论。

我们试着以下述坐标来表述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



实践表明,只有将上述四种哲学基础加以有机辩证的融合,才能全面构筑当代大学精神文化体系,全面体现大学的功能,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之道。本人依据上述四个方面的哲学基础,试着提出:“大学之道,在明德亲民,在以人为本,在包容会通,在止于至善。”

大学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必将为推进大学人提高文化自觉,特别是提升哲学自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相信经过锲而不舍的共同努力,可以确立今后一个时期引发大学人思考以至遵循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大学之道,并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确立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应该是中国大学文化研究会的一个重大使命。

三、历练大学人的哲学性格,增强中国大学文化自信

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①。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哲学应该成为大学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哲学生活理应成为大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没有哲学的导引,大学就会像一个没有“神灵”的庙堂。在1999年中国科协首届年会上,科协主席周光召指出:为什么20世纪初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因为德国“发挥哲学的突破和指导作用”“德国在哲学上率先脱离机械论和绝对论的束缚,发展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德国的科学家都有很高的哲学素养”。实际上,德国一度成为世界教育和科学中心,正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校所实施的哲学与教育的融合,或者说正是康德、费希特、洪堡等哲学家兼教育家所奠定的哲学文化基础,包括洪堡在新人文主义哲学观指引下所确立的“教学与科学相结合,由科学达致修养”的大学理念所奠定的人才基础,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述“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强调的理论思维就是哲学思维。砥砺大学自身的哲学性格,提升哲学思维的自觉程度和哲学分析能力,是倡扬大学文化自觉的重要前提与内涵,也是提升文化自信的理性基础。

中国古代有文可查最早提出自信的是哲学家墨子所述:“君子进,不败其志……彼有自信也。”(《墨子·亲士第一》),孔子曰“吾心信其成,则无坚不摧”(《论语·仁语》),梁启超先生说:“自信力者,成就大业之原也。”(《饮冰室文集》之五)。文化自信是人们对自身主导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力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自信。他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他不仅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我国文化自信的源泉,这理应是我国高等教育文化自信的源泉。

怎样建立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首先,要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信。云杉在《红旗文稿》(2010/15)撰文指出:做好文化自信,“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思、比较、展望,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指出:“不忘本来”就是勿忘“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吸收外来”是指“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着眼将来”是指“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历史的辉煌,更来自当今中国的蓬勃生机,来自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而储朝晖研究员在“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一文中从教育的角度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中国教育要建立自信,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中国教育自信建立在中国广博的文化根基之上。第二个层次,当今中国人的教育自信要建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教育的全面了解基础上。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的教育自信要基于专业理性,而非简单地与别人比较。”他们都强调了文化自信需要抱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在本质上就是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实际上,当今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坚实的发展现实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奇迹,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得以确证与彰显。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软实力”提出者、哈佛大学约瑟夫·奈参观了曲阜孔庙后说:“为什么中国能发展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①美国企业战略家库恩·劳伦斯·罗伯特告诉世人:中国“经济上的变化只是我所看到的第二个最大变化;中国真正最大的变化是人民的精神和思想——他们的看法和见解、开放性的思维、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自信、他们走上世

① 詹得雄:《历史没有终结 探索永无穷期——对中国式治理的思考》,《参考消息》2015年7月2日。

界舞台时所表现的那种热情,还有他们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个人自由”。^① 在这些历史性变化中,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实践功不可没。只要深入到高等教育的一线,看看那些为强国富民、探求真理而艰苦拼搏的师生和所取得的骄人业绩,是可以确立必要的自尊与自信的。

同时,文化自觉自信应该建立在清醒的文化自检基础之上。没有认真而深刻的文化自我反思与批判,就不能确立理性的自觉和科学的自信。马克思认为唯物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 由于“在哲学的反思中,所有的思想都是反思的批判对象。哲学批判所要实现的,是整个思想逻辑层次的跃迁,也就是实现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的变革”^③,所以,以哲学的批判思维思考、认识大学文化,带有整体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意义。从“不忘本来”看,既要看到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自身优良传统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又要清醒认识几千年所积淀的消极文化因素,如官本位、经验主义和人情文化,对作为现代化特征的理性精神文化的阻滞作用和对大学的负面影响;从“吸收外来”看,既要努力吸取西方文化中理性批判思维、法治意识以及对于人的个性发展与主体性的尊重等积极元素,又要规避其个人本位以及以工具理性屏蔽价值理性的消极影响;从“着眼未来”看,更要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和要求出发,看到现实世界道德境界和创新意识的不适应。

20世纪以来,在多元文化交流激荡中,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艰难的文化选择,张岱年先生是对文化选择进行哲学探索的一个典范。1936年,张岱年先生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新路,主张“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20世纪80年代,他又发表了《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汲取西方有价值的文化,逐步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综合中西优秀文化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体系”。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晰的哲学模式。继而,在20世纪末,又提出要“把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活智慧、西方最新科学发展中的新智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智慧,都综合起来,构成现代新型方法论——大成智慧

① 库恩·劳伦斯·罗伯特:《我看到的中国变化》,《环球时报》2005年11月16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18页。

③ 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70页。

学”^①。而他所依据的就是“兼和”哲学观,即“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②。我们应该将大学文化置于互相融合的高等教育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的哲学基础上,以张岱年倡导的“兼和”哲学观和“大成智慧学”,通过实事求是地理性比较、反思、批判与实践,努力做好文化的选择、兼容和创新,这应当是当代中国文化包括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体现现实针对性和提升时代适应性的重要指导思想,亦是当今文化自觉自信的哲学基础和重要体现。

① 方克立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② 《张岱年文集(第3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

教育与文化

——关于文化教育的哲学思考

孟建伟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要:文化教育是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它是对狭隘的知识教育所做的重大突破和超越。从知识教育走向文化教育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和背景,即从知识论的认识论到文化论的认识论的转变。文化教育所蕴含的目的论和方法论是“以人化文”和“以文化人”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既用“人化”推进“文化”,同时又用“文化”达成“化人”。“人化”和“化人”的有机统一,有着特别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教育;文化;文化教育

作者简介:孟建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关于科学文化的哲学思考”(批准号:10BZX025)的研究成果之一。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教育哲学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何要提出文化教育的理念?文化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文化教育蕴含什么样的目的论和方法论?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教育与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从而凝练关于文化教育的理念;同时,通过对文化教育理念的阐述,从而揭示教育与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

一、为何要提出文化教育的理念

关于文化教育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是针对知识教育提出来的,因而其动因十分明确:其一,在理论上,它要从根本上突破并超越知识教育的狭隘框架,用文化教育的新理念引领教育,从而实现从知识教育到文化教育的范式转变;其二,在实践上,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的现状,用完整而全面发展的

文化培育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同时,也让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推进文化的完整而全面的发展。

其实,关于教育与文化之间关系最核心也是最深刻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和调动文化的资源和力量来推进教育,用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文化培育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与此同时,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和调动教育的资源和力量来推进文化,用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推进文化的完整而全面的发展。当然,无论是培育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还是推进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文化,都离不开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教育。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所有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因而可称其为文化教育。它基于关于教育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将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教育、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和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文化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试图以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教育,培育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并推进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文化。

可见,文化教育对知识教育的突破和超越是全方位的,包括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目的等所有方面。在教育内容上,知识教育强调的只是知识,而文化教育强调的是包括知识在内的整个文化;在教育方法上,知识教育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得知识,而文化教育不仅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得知识,而且更注重如何最大限度地学会创新;在教育目的上,知识教育培养的是专门的知识人,并依靠专门的知识人来推动知识的创新和进步,而文化教育不仅要培养专门的知识人,更要培养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文化人,并依靠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来推动知识和文化的创新和进步。

当然,文化与知识二者并非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包容关系,因为文化与知识二者并非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包容关系。例如,科学文化与科学知识、艺术文化与艺术知识、哲学文化与哲学知识等,都是一种包容关系。所谓文化,例如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或哲学文化等,在本质上都是人的一种精神创造。^[1]而知识,例如科学知识、艺术知识或哲学知识等,则是人的这种精神创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或是人的这种精神创造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尽管不同的知识在相应的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例如,科学文化的精神成果具有很强的知识性,以致人们往往将科学等同于知识;艺术文化的精神成果则具有很强的体验性,知识内化成了作品背后的理性的力量;而哲学文化的精神成果有的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有的则具有很强的体验性。但是,不同的知识(例如,科学知识、艺术知识或哲学知识等)本身都是不同的文化(例如,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或哲学文化等)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知识来谈论文化,文化就会

变得非常模糊而空洞;反之,离开文化来谈论知识,知识就会变得过于僵硬而抽象。因此,文化教育并非要否定和排斥知识教育,而是要揭示知识与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特别是将知识放在人的整个创造过程中加以研究和考察,从而将僵硬而抽象的知识教育变成生动而鲜活的知识教育,变成整个文化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教育的最大缺陷和问题就在于:其一,它将作为整个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当作教育的唯一内容,而将作为整体的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排除在教育的范畴之外。这种定位和导向注定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也是当今教育为何导致文化缺失的重要根源。

尽管知识本身就是整个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十分重要的维度,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只是整个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知识只是人的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而不是所有的维度。对于整个文化来说,知识更多地代表着逻辑的、实证的和技术的形而下层面,除此以外,文化还包括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形而上层面;知识更多地代表着创造过程中理性的元素,除此以外,文化还包括创造过程中诸多感性(非理性)的元素;知识更多地代表着人所创造的精神成果,除此以外,文化还包括人的整个创造过程。同理,对于人的发展来说,人不仅需要形而下的坚实的逻辑和实证的技术和知识,而且更需要具有形而上的包括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在内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人不仅需要健全的理性,而且更需要有完整而丰满的感性;人不仅需要通过对已有知识的学习和把握,从而能够学以致用,而且更需要通过对创造过程的体验和领悟,从而学会如何创造新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因此知识教育由于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使其难以用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文化去培育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更难以让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去推进文化的完整而全面的发展。

其二,它不仅将作为整体的文化排除在教育的范畴之外,而且还从根本上切断了知识的生命之根、文化之根和创造之根,从而不仅从根本上消解了知识的文化内涵,而且还将活的知识变成了死的知识。也就是说,即使就知识教育本身而言,这种定位和导向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和偏颇,即它在强调知识教育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的同时,丢失了知识教育本应具有的人性、文化性和创造性,从而不仅进一步导致教育的人性和文化缺失,而且进一步导致教育的创造性缺失。

无疑,知识教育对知识给了特别的重视和强调的确无可厚非。毕竟,知识是所有文化创新中十分重要的元素,也是不少文化特别是科学文化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和精神成果。况且,知识还具有无与伦比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关键是,如何理解知识的本性?如果将知识一味地理解为同人和文化特别是同人的创

造无关的自我封闭的逻辑体系,如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所说的“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2]那么,这样的知识教育不仅势必导致切断知识的生命之根、文化之根和创造之根,使知识失去人性、文化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活的知识变成死的知识,而且势必导致切断教育的生命之根、文化之根和创造之根,使教育失去人性、文化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活的教育变成死的教育。

无疑,当今教育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人性缺失、文化缺失和创造性缺失问题,都同这种狭隘的知识教育密切相关。提出文化教育的理念,就是要从根本上克服和纠正知识教育的缺陷和偏颇,不仅要重新找回知识的生命之根、文化之根和创造之根,从而提供完备而健全的知识教育,而且更要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文化教育,在培养完整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同时,也推进文化的完整而全面发展。

二、文化教育的认识论基础

文化教育的理念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如果说,知识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知识论的认识论,那么,文化教育的认识论基础则是文化论的认识论。所谓文化论的认识论,是蕴含在“科学文化哲学”^[3]这种新型科学哲学的一种新型认识论。它对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知识论的认识论,做了重大突破和超越,从而为文化教育奠定了坚实的认识论的基础。其主要突破和超越在于:

其一,从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走向凸显认识主体的认识论。

知识论的认识论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所谓“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原本出自波普尔,用来概括他的所谓“柏拉图式的世界理论”或“客观精神的理论”,也即所谓“第三世界”理论。^[4]当然,也可以用它来概括波普尔的认识论,因为他把认识论看成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5]在他看来,“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它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6]其实,不仅波普尔的认识论是如此,而且整个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认识论都是如此。

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关注的是“经验证实”,并将科学的进步归结为“真的经验命题”的积累;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关注的是“经验证伪”,强调“知识通过批判和创造而增长”;^[7]而库恩、拉卡托斯和劳丹的历史主义认识论则关注的是科学史的逻辑模式,分别试图用“范式”“研究纲领”和“研究传统”来阐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等问题。尽管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本质上都属于知识论范畴,都是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

这种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在其认识论的框架中,只有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而没有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它关注的是人所获得的知识,